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檣杌說：從「詩史」的角度論晚明清初的《楚辭》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004-057-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廖棟樑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禱杙說：從「詩史」的角度論晚明清初的《楚辭》研究  
計畫編號：NSC94-2411-H-004-057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廖棟樑

中英文摘要：

「詩史」之名，原是對杜詩的特稱，偶爾也指其他詩人紀實性的作品。而在明清時期，「詩史」的概念已推衍到更多詩人的作品中，李賀、李商隱等那些沒有任何紀實因素和時間標誌的文本，也被清人視為「詩史」的一種變體，納入「詩史」的視野。姚文燮注李賀詩聲稱：「必善讀史者，始可注書；善論唐史者，始可注賀。」又說：「世多以詩注詩，而不知本於〈騷〉；又以〈騷〉注詩，而不知本於史。」在詩文方面，既已是推尊「詩史」，力崇「比興」了，自然也可以此觀點推衍到《楚辭》，因此，明代中葉以降，〈離騷〉重獲重視，《楚辭》研究也打破了長期以來拘守舊說，因襲停滯的局面，而逐漸形成繁榮的氣象。「嘗謂〈騷〉存而《禱杙》可廢，夫《離騷》固《禱杙》之精華也。」是故，晚明清初《楚辭》的研究不是孤立、個別的現象，不通過「詩史」觀念的考察，恐怕很難深刻地理解晚明清初《楚辭》研究的許多重要問題，對於理論及實踐上的傳承發展，也不易董理貫串。

他們認為「在『詩史』說的歷史框架裏，詩人感事而吟，對應於史家實錄；詩人比興藝術，對應於史家書法；詩人興諷之旨，對應於史家褒貶之義；詩人忠愛之忱，對應於史家殷鑑之用。」緣此，晚明清初《楚辭》研究的進程，「以史入騷」首先指出屈辭關懷時代、諷諭現實的「詩史」性質，其次揭發屈辭比物連類、含蓄委婉的「比興」託喻，在這二項詩歌本質的理念基礎下，選定的箋釋方法就是「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

總之，本計劃嘗試通過有關「詩史」的思考，揭明貫穿在晚明清初《楚辭》研究的學術傳統和基本原則：實證化的學術取向、比興批評與寄寓感懷。闡明他們對屈辭的歷史重構、文本解讀以及反照自身的「借杯澆臆」。

關鍵詞：詩史、比興、以意逆志、知人論世、晚明清初《楚辭》學

Abstract：

Originally “Shi Shi” (詩史) is the particular term for Du Fu (杜甫). Sometimes it also can include the literary works which record the

facts. In addition, some poems which have no facts recording and any time marks are also considered as one kind of new style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Shi Shi” (詩史), such as Li He (李賀) and Li Shang-Yin’s (李商隱) poems. For poetry and other literary works, “Shi Shi” (詩史) and “Bi Xing” (比興) are both admired and respected. Thus the meaning of “Shi Shi” (詩史) can be extended to “Chu Ci” (楚辭)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From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the study of “Li Sao” (離騷) is considered importantly again. Then the study of “Chu Ci” (楚辭) becomes more and more glorious because of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studying ways which have made the study stop. Therefore, the study of “Chu Ci” (楚辭) is not isolated and individual. Through examining the idea of “Shi Shi” (詩史), it will be better for people to completely comprehend the important problems about the study of “Chu Ci” (楚辭)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ithin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the idea about “Shi Shi” (詩史), poets compose poetry because of their own mental reactions.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facts recording of historians. “Bi” (比) and “Xing” (興) which are poets’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this part corresponds to historians’ writing methods. Poets compose poetry with main ironic points, and it corresponds to historians’ criticisms in historical works. Poets’ passion with love and loyalty corresponds to the functions of lessons and warnings that historians show. From this point, the proceeding on the study of “Chu Ci” (楚辭)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firstly begins with the ironic characters of “Shi Shi” (詩史) that shows Qu Yuan’s (屈原) care and attention to the time and his country. Secondly, it explains the irony of “Bi Xing” (比興) which is figurative and implied. On these two essential foundation of poetry, the ways of explanation are “Zhi ren lun shi” (知人論世) and “Yi yi ni zhi” (以意逆志).

To sum up, through thinking about “Shi Shi” (詩史), the proposal tries to reveal the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basic rules on the study of “Chu Ci” (楚辭)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is will als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Jie huai jiao yi” (借懷澆臆) which covers reconstructing history, explaining text and reflecting themselves

from Qu Yuan's (屈原)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Shi Shi (詩史), Bi Xing (比興), “Zhi ren lun shi” (知人論世), “Yi yi ni zhi” (以意逆志), The Study of “Chu Ci” (楚辭)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Qin Dynasties.

### 一、「詩史」的定義

「詩史」一詞在古代有兩種意思，一指前人的詩作，如《宋書·謝靈運傳論》云：「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一指「善陳時事」、「敘事工絕」而寓「褒貶」之意，顯忠愛之忱的詩歌。用宋方逢辰〈劭英甫詩集序〉的話來說是「以史為詩」，用何夢桂〈王樵所詩序〉的話說，是「以詩為史」，用林景熙〈宋景元詩集序〉的話來說，是「詩中有史」。文學史上討論的「詩史」一般指的是第二個意義。「詩史」之名，原是對杜詩的特稱，偶爾也指其他詩人紀實性的作品。而在晚明清初時期，「詩史」的概念已推衍到更多詩人的作品中，甚至李賀、李商隱等那些沒有任何紀實因素和時間標誌的文本，也被清人視為「詩史」的一種變體：「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納入「詩史」的視野。

「詩史」說自唐代提出，宋代人作了論證，到了明代，「詩史」的詩學觀念和杜詩「詩史」的地位受到挑戰與質疑，明人從辨體入手，辨別詩文之別，辨別詩歌自身的詩性與非詩性之別。由辨詩文之別，詩與文章要嚴格區分開來，詩與史自是壁壘分明。也正因為體察到詩歌表達方式的特殊性，所以很自然地也會逼使他們重新去探索思考傳統有關比興的問題。整個明末，由比興的再強調，而否定了「詩史」的觀念，但到清初又從講究比興寄託而探尋到詩與史的關聯。其結果自是將這二個觀念結合，「詩史」與「比興」形成明末清初許多人的詩學主張。

同時，「詩史」又不僅是個詩學觀念，更是一個價值觀念，借錢謙益的話是「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那麼，史的精神是什麼？就是要在詩歌中表現「千古之興亡升降感嘆悲憤」。以此為中心而歷史地展開的人文詮釋活動，實際上便是古代知識份子在面向現實之際，依託於對傳統的確認而反照自身、闡明心志、批判現實的精神行為，其中積澱著大量的思想經驗和歷史本事。

明末清初的詩學思潮，既由「詩史」的反省而推衍出「比興」來，然後在這二個詩歌本質的觀念的基礎下，關連到箋釋方法便是普遍採用「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一方面意會作品言外的作者用意，一方面考証作品言內的事實。把文學詮釋的「意」和歷史考定的「注」結合起來的方法，可以說是明末清初詩歌注解最典型的範式。對杜甫、李賀、李商隱三家詩的箋釋大體上沒有什麼不同，同樣對《離騷》的箋釋也無二致。如果說批評方法背後總有一種批評觀念在，那麼明末清初的《楚辭》注本都是在其「詩史」的審美觀念下形成了釋義原則與方法。

## 二、以史入騷：《楚辭》的歷史學

學者討論「詩史」時其源頭除追溯至《詩經》外，也都上溯《楚辭》，譬如仇兆鰲在《杜詩詳注》中每每以《楚辭》注杜詩，有意探尋杜詩與《楚辭》的承傳脈絡，據不精確統計仇注中據《楚辭》注杜詩者就約有 260 條。再如，姚文燮注李賀詩聲稱：「必善讀史者，始可注書；善論唐史者，始可注賀。」又進而說：「世多以詩注詩，而不知本於〈騷〉；又以〈騷〉注詩，而不知本於史。」可知《楚辭》是李賀詩之本也。復如吳喬撰《西崑發微》認為義山詩確是原本〈離騷〉，固然朱鶴齡在其〈西崑發微序〉中亦說：「自〈國風〉寢微，〈離騷〉繼作，其辭之詭詭瑰麗，幽渺凌忽，以視成周太史所稱，誠有間矣。」卻也從反面印証《楚辭》與「詩史」說的關係。顯然，談「詩史」時總會關涉到《楚辭》，二者關係密切。

孟子嘗說過：「《詩》亡然後《春秋》作」，漢儒說《詩》也多以史証詩，在「詩即史」的影響下，唐劉知幾即云：「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也，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顯然，由「文之將史，其流一焉」觀之，劉知幾將屈辭視同史書。說屈原「不虛美」、「不隱惡」，由此呈現出一不同於歷來所接受的「澤畔行吟」、「憂悲愁思」的屈原形象。王世貞曾說：「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必采而列之楚風。」汪瑗在其《楚辭集解》裏便進而歸納說：「世稱杜集為詩史，而不知《楚辭》以先之矣。」這就是說屈辭中也有「詩史」的意義。爾後，陸時雍申述曰：「故夫《三百》者，《春秋》之精華也。……嘗謂〈騷〉存而《檮杌》可廢。夫〈離騷〉固《檮杌》之精華也，亦猶《三百》之於《春秋》也。」拈出〈離騷〉「檮杌」說。「檮杌」是楚國史，一如晉之乘，魯之春秋。陸氏又說：「余概題以『楚辭』者，備楚風也。」周拱辰同樣也說：「〈離騷〉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而在，取節之續十五國風之後，何遽出〈小戎〉、〈蒹葭〉下哉？故曰〈離騷〉者，楚補亡之詩。」陳維崧在其《陳迦陵文集》中說：「讀〈秦風〉、《楚辭》二書，知嬴氏興而芈氏廢矣。」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同樣，蔣驥在《山帶閣注楚辭·楚世家節略》徵引孟子「知人論世」而謂「將使讀屈子之文者，有所參考，又以知楚之治亂存亡，繫於屈子一人。」也視《楚辭》為「詩史」。凡此種種，都是明清流傳甚廣的說法，有著廣泛的影響，經常為人引用。

總之，「詩史」說自唐代人提出，宋代人作了論証，經過明代人的辯証，明清之際，由於「天崩地解」的時會，學風文風的轉變，「詩史」說再次成為詩學的論題，成為當時詩歌創作和批評的一個重要理論原則。他們既已是推尊「詩史」，力崇「比興」了，自然也可以此觀點推衍到《楚辭》，因此，明代中葉已降，〈離騷〉重獲重視，出現了一批新的《楚辭》研究專著。這些著作破除朱熹《集注》對於《楚辭》學的壟斷，共同促成了明代後期《楚辭》研究繁榮的局面

晚明清初學者認為「在『詩史』說的歷史框架裏，詩人感事而吟，對應於史家實錄；詩人比興藝術，對應於史家書法；詩人興諷之旨，對應於史家褒貶之義；

詩人忠愛之忱，對應於史家殷鑑之用。」緣此，晚明清初《楚辭》研究的進程，則須博考史事，推求至隱，以得其用心，以通其詩意，運用以史證詩的方法注釋《楚辭》。與此思潮相應，關於《楚辭》藝術的研究，也在明末清初盛行，或提出「寓言說」如汪瑗、林雲銘等；或拈出「幻境」說、「想像」說，如蔣驥、魯雁門等。他們能夠將義理分析與藝術技巧分析結合起來，從而使他們對於《楚辭》思想、藝術的理解空前地加深了。

明末清初的《楚辭》學者拈出《楚辭》是「詩史」，就是欲圖通過疏釋《楚辭》揭示大義，既圖匡正世風，亦有其「借杯澆臆」的目的。借用黃文煥的話，即是：「余所冀王明之用汲，悲充位之胥讒，自抒其無韻之騷，非但注屈而已。」

是故，晚明清初《楚辭》的研究不是孤立、個別的現象，不通過「詩史」觀念的考察，恐怕很難深刻地理解明末清初的《楚辭》學的諸多重要論題，對於理論及實踐上的傳承發展，也不易董理貫穿。

然而，到目前為止筆者所蒐集的資料中，較具代表性如龔鵬程先生的《詩史本色與妙悟》闡釋「詩史」的觀念及其帶生的複雜狀況，在我國詩歌發展過程中如何影響明清詩與詩論的形成與內容。顏崑陽先生的《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則以李商隱詩箋釋為例，說明在「詩史」與「比興」的思潮下，這套箋釋方法的進路。郝潤華先生的《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証方法》乃舉錢謙益為研究對象，討論其如何將以史証詩和以詩証史的方法系統化。許楠德先生的《論詩史的定位及其他》則涉及「詩史」產生的歷史與文學條件，替「詩史」尋求定位。鄧小軍先生的《詩史釋証》是運用詩史互証方法的中國詩史個案研究論著，分別對陶淵明、杜甫、韓偓、錢謙益、陳三立等詩人做深入考察。這些著作，或理論，或實踐，固然豐富、深化「詩史」的議題，卻都未有涉足「楚辭學」，不能不說是「詩史」說的缺漏。

同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總括《楚辭》研究使的發展時認為，王、洪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朱熹乃「槩括舊編，實為此本」，又說：「由東漢至宋，遞相補苴，無大異詞。迨於近世始多別解，割裂補綴，言人人殊。」這種由章句訓釋何以轉到注意義理、藝術探究，《楚辭》研究者也皆未能從「詩史」思潮去考察，所以，所有關於明末清初「楚辭學」的論述總讓人有隔靴搔癢，抓不住重點之感。

綜此，透過本計畫之研究，當可開顯《楚辭》研究的新貌，重新認識晚明清初的《楚辭》學，重估其歷史意義。

### 三、歷史重構：對屈辭時地的考証

#### (一) 年表的製作：

年譜的編輯與作品的繫年是「詩史」思維下的產物，通過年譜及基於年譜的作品繫年，不僅可以瞭解詩人的「出處」，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詩人生活時代的「時事」以及「時事」與「出處」的交錯點所產生出來的詩人的「意」。因此，林雲銘《楚辭燈》說：「屈子所著之文無先後次序考據，茲將曰『三』（按疑

為「二」之誤)君在位事蹟,按年編輯,參之《史記》本傳。凡有明文者,即繫於各年之下;如無明文,亦可以各篇語意推之,以備讀者之參考。庶不至如舊注一味強解,即以為屈子之年譜可也。」緣此,林雲銘在正文之前,列有《史記·屈原列傳》和〈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跡考〉。其中,〈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跡考〉綜合《戰國策》、《史記》等典籍,起懷王元年(前328),終於頃襄王三十六年(前264),以大字為正文,記載楚國這段時間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大事;以雙行小字為注文,附有屈事迹及其作品年代。當然,視此為「屈原年表」,仍嫌粗疏。稍後,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也在卷首除列有〈屈原列傳〉、〈屈原外傳〉外,復「倣林西仲本,輯〈楚世家〉懷襄二王事蹟著於篇」,作〈楚世家節略〉。但他認為「若林反取原賦二十五篇,鑿空而分注之,則吾豈敢」,態度相當謹慎。文中既對屈原諸作有繫年,又對人如朱熹、黃文煥、林雲銘與王夫之等說法皆有駁辨。拿蔣書楚懷王十一年為例:「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共政秦,楚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皆引歸。」蔣驥首先於〈節略〉文「函谷關」下注明「在今河南寶靈縣」,作為古今對照之用,因為地名沿革也是時間距所造成的理解障礙之一。又注曰:「按:《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當在是年之前後。蓋屈子為懷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精明如此,〈惜往日〉所謂『國富施而法立』也。」史詩互證,所言亦較林氏詳盡。〈楚世家節略〉,從楚懷王元年(前328)張儀相秦始,至頃襄王三十六年(前264)頃襄王卒,孝烈王立止,共附按語十三條,雙行夾注三十條左右。

## (二) 地理的考索:

關於屈原遷謫後的行踪,王逸、洪興祖及朱熹等的說法卻稍嫌模糊,明清學者開始有較具體、細緻的考辨,黃文煥據《史記·屈原列傳》「王怒而疏屈平」云,乃謂此「則僅減信任之事,非放也。」至頃襄王之時,則屈原放逐於江南沅湘之間。此說後來林雲銘、王夫之、王邦采等人大加引申、張揚。蔣驥更據屈原事迹的年月、道里的遠近,一一求之於實際,按之於地理,在知人論世後,將「世運」的探求擴大至地理的鈞稽,使注釋立於實地,借用閻若璩的話是:「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

職是,在〈節略〉之後蔣驥首先繪有〈楚辭地圖〉五幅:「楚辭地理總圖」、「〈抽思〉、〈思美人〉路圖」、「〈哀郢〉路圖」、「〈涉江〉路圖」與「〈漁父〉、〈懷沙〉路圖」,欲使屈原行迹,可以一目瞭然。圖前〈小序〉云:「余所考訂《楚辭》地理,與屈子兩朝遷謫行蹤,既散著於諸篇,猶恐覽者之未察其詳也。」蔣驥一方面既把楚國歷史事變作為了解地理環境的嚮導;另一方面又把地理環境作為認識歷史事變的參考圖籍,從而使二者渾然一體,象中蘊理,理以象出,「以知楚之治亂存亡,繫於屈子一人。」「嗚呼,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於此判焉。這如同翻閱發黃的照片或舊時的物品最容易引發人們往事回憶,關於歷史的記憶也一樣。蔣驥通過地圖的呈現及古今地名的標記,作為觸媒的激活,屈原貶謫的行蹤在五幅宛如連環畫一樣一頁一頁地呈現,「忠君愛國」的形象也因此得以不斷復蘇和重構。因此,知人論世後「世運」的探求擴大至地理的考察。

其次，《楚辭地圖》只是蔣驥研究《楚辭》地理的一部分，只是將後面分散的結論集中於圖中形象地顯現。蔣驥以地理學研究《楚辭》，遍見注文及〈餘論〉。關於此部分的考証，尤能彰顯他「不逞臆解，不務鑿空，語而詳，擇而精」的「實事求是」的特色。其精彩處在於考訂〈九章〉諸篇的寫作時地，不僅用力最深，也頗有獨到之見。對蔣驥而言，清楚〈九章〉寫作的時地，比其他作品顯得更為重要，這是因為〈九章〉地記錄屈原的經歷，成為研究他的生平的第一手材料。所以，蔣驥是以〈九章〉為中心推論其他各篇作時。針對〈九章〉各篇實際內容，他「稽諸往事，參之地理」，遂斷言「〈九章〉雜作於懷襄之世，其遷徙固不皆在江南。即頃襄遷之江南，而往來行吟，亦非一處。」其中以考〈涉江〉、〈哀郢〉、〈懷沙〉又特加詳辨，最能展現「知識性箋注」的特色。案當時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致有兩條途徑，一是側重實地考察，二是側重文獻的鈎稽。蔣驥基本上是從文獻排比入手，輔以實地見聞。譬如〈懷沙〉一篇，東方朔〈七諫·沈江〉有「懷沙礫而自沉」之句，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沈汨羅以死。」朱熹即據此斷定「懷沙，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歷來皆以懷抱沙石解。自汪瑗首創「懷沙」即「懷長沙」之說，李陳玉從之，蔣驥認為「其說特創而甚可玩」，而為之申發「曰懷沙者，蓋寓懷其地，欲往而就死焉。」是想歸死「先王故居」為「狐死首丘」之意，故〈懷沙〉非絕筆之作。對此，蔣氏作了具體的地理考証。

為了反駁「長沙之名，自秦始建，且專以沙名，未可為訓」的觀點，在詳引《山海經》、《戰國策》與《史記》後，更廣徵《湘川記》、《遯甲經》、《路史》、《神農紀》、《黃帝紀》、《長沙志》和《方輿勝覽》等諸書有關記載，證明「長沙」之名始於戰國之前，並且是楚國熊繹的封地。蔣驥精於地理，援引詳贍，對〈懷沙〉的辨証，自然引人注目。

總而言之，蔣驥對歷史的重構，徵引宏博，考據翔實，知人、論世並論地。如他所言：「今所注或濫引諸子讖緯及稗史言，不能闕疑是吾過也。」在詩史思維下，這種期待儘可能如實把握的徵實傾向，就如周裕鍇對清代經學闡釋學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把闡釋活動當作一種知識的考証，無論是本文的復原、本義的重建，還是本事的指認，本意的推測，無不以『實事求是』為主臬，甚至可以一言以蔽之：『闡釋即實証』。」移用於蔣驥亦然。《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謂蔣氏之書為「徵實之學」。

#### 四、文本解讀：比興批評

晚明清初學者既知人論世並論地，參稽史傳及生平，以求言外隱衷，肯定其言外隱衷，多寓忠愛之意。然而，屈辭多香草美人、神話傳說，宛若《春秋》屬辭比事。既然創作多託興深微，解釋自然得旁推曲敲，講究比興索隱了。

##### (一) 草木史

大體傳統《楚辭》學者皆認為香草的芬芳隱喻象徵屈原人格品質的自我期許，除此之外，在「詩史」視野中，由於政教理想與比興譎諫的結合，論者復從總體



上對香草喻意的解釋更有喻國君或賢者兩種不同的看法。例如：「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句，漢王逸注曰：「眾芳，喻群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並且具實指出所謂三代賢臣乃「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伯益、夔，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眾芳之效也。」以「眾芳」喻群賢，此說洪興祖、朱熹皆從之，而晚明清初的周拱辰、林雲銘、朱冀等人更是發揚光大，而蔣驥卻認為「眾芳，言其德之備也。……言堯舜知明而守固，能遵用三后之道而致太平。原蓋以三后自比，而望其君為堯舜也。」由此「眾芳」則當是比君。又如「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獨懷乎故宇」句，王逸章句曰：「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乃以「芳草」喻「賢芳之君」，朱熹、王夫之等人從之，而林雲銘卻以為「何處無修潔之人，兩美必合，得所依歸，可以自樂其樂。」蔣驥也以為「何所獨無芳草，言隨處有賢士見用也。」顯然，不同的箋釋者對「眾芳」與「芳草」各自的喻義已有比君、喻賢的異說。對此，汪瑗反省說：「按篇內所言芳草，或以比君，或以比臣，或以比人，或以比德，或以比時；或有比者，或有無比者，亦不可一概而漫視之。舊注不知此意，故其解多牽強，脈絡不明，一出焉，一入焉，卒莫能有一定之說也。」

在香草的比興詮釋上，一種情形是直接徑直具體坐實香草，既然「以詩為史」，而且屈原筆下的花草確有人的氣息，似人栩栩然，如下文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以專佞以慢慝兮，椒又欲充夫佩褱。既干進又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蘭之「無實容長」、「委厥美以從俗」，椒的「專佞以慢慝」，和椒「既干進又務入」，都屬於人的行為，自然引起學者聯想到當時的某人某臣，他們主要依傍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中載有「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及《漢書·古今人表》也有「令尹子椒」的歷史事實，以史證詩，以事解詩，一篇〈離騷〉「言蘭者十，言椒者六」，屈原反復吟詠，多次提到。所以，「椒蘭」的訓釋便是其中一例。最早持「椒蘭」比附說的當推東方朔、揚雄和班固、王逸，南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更是將之轉化為史傳的分卷立目。晚明清初學者依附此調的不乏其人，尤其周拱辰《離騷草木史》，故清陳本禮《屈辭精義》總結說：「蘭、芷、椒、椒，皆實有所指，此子蘭聞之所以怒也。」但這種坐實的比興批評，反對者亦復不少，朱熹首先駁斥，曰：「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吳世尚繼云：「夫〈離騷〉通首俱是托物陳詞，比興達意，不應於此而忽實指二人之名，乖通篇之體也。」以為用史實解比興，詩意安能活絡。對此爭論，王夫之則持折中立場曰：「此五類香草，皆以喻昔之與原同事，而未入於邪者。當日必有所指，而今不可考爾。」

如同詩人在詩中一再強調自身的道德修煉與高潔品行，於是潔與汙、美與醜的對立，經過屈原創意性的構思，便形成屈騷的象徵意象是二元對立，而香草的象徵也是以對立面臭物的存在為其條件。王逸〈離騷序〉早說過：「善鳥香草，

以譬君子；惡禽臭物，以比小人。」故吳仁傑著《離騷草木疏》雖說是草木之疏，卻也以香臭分類，前三卷專疏芳草嘉木，第四卷「蕝草附錄」專疏蕘、蕘等讒花媚草。他在此書的跋中說：「根莖華葉之相亂，名實之異同，悉本本元元，分別部居，次之于槩，會萃成書，區以別矣。」又說：「〈離騷〉以蕝草為忠正，蕝草為小人，蓀、芙蓉以下四十又四種，猶青史氏忠義獨行之有全傳也。蕘、蕘、蕘之類十一種，傳著卷末，猶佞幸奸臣傳也。彼既不能流芳後世，姑使之遺臭萬載。」於此可見《離騷草木疏》取史家立傳以分忠佞的意識，在辨證名物的同時，側重闡發〈離騷〉借草木以象徵君子小人、美醜善惡的比興寄托。吳氏之後，晚明的周拱辰《離騷草木史》，他在自序中稱「〈離騷〉者，楚補亡之詩也，而即孔子未刪之詩也。」因此，他也說：「草木之中，有君子焉，有小人焉。一一比其類而暴其情，使蕭、艾、蕘、蕘，知所顧忌，而不敢進而與蘭、芷、江蘺競德，凜凜乎衰鉞旨也。以治草木而還以治草木者治人，是所望於靈修者摯焉爾。」是顯出來的是史家貶之義法。

香草比興作為詮釋批評是一種象徵批評，而且是寓言式象徵 (allegorical symbol)。寓言式象徵的特點，是一群象徵被組織在固定中，象徵與被象徵物不必靠變動的聯想來連結，而是形成一對一的關係，於是評者所欲詮釋的世界就複製在象徵世界中，上引王逸論〈離騷〉的那一段話的確喻義是清楚的。既然象徵符號背後的寓意是既定的、前知的，也就是說其用以託喻象徵的符表與所託之意的符義之間，是有著一種明白的被限定之作用關係的，我們稱此為「公共象徵」(public symbol) 或「慣用性象徵」(conventional symbol)，故而只需要闡明符號與寓意的聯繫方式即可，這可以說是一種「主題先行」的批評。於是，詩意的發掘闡釋就成為技術化的操作程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戴震才認為：「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

## (二) 男女君臣之喻

「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往往寄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朱長儒〈李義山詩注·序〉)考〈離騷〉男女君臣之喻，發軔於朱熹《楚辭集注》，陸時雍《楚辭疏》則給以明確化，他說：「或問乎〈離騷〉曷離爾？曰：義取諸天婦也。曷君臣而夫婦之？屈原深被寵眷，諸臣莫與比肩，上官大夫、靳尚之徒心害其能而讒間構之，王又不寤，賜之遠去，其離窮矣。辨之言曰『重無，怨而生離』，此〈離騷〉所以作也。」至於，〈離騷〉「求女」之喻義，晚明清初學者多有歧，或謂喻求賢臣，如王夫之；或謂喻求賢君；如汪瑗，或謂喻求理想政治，如陳玉；或謂喻求賢后妃，如趙南星；或謂喻秦楚婚姻相親，如黃文煥；或謂喻求賢諸侯，如蔣驥等等，甚至直接坐實某某，影射某某，凡此總總，莫不遵守政教比興寄托的原則。

## (三) 藝術性的探討：寓言的幻境

明人既從辨體入手，辨別詩文之別，辨別詩歌自身的詩性與非詩性分分，由

辨詩文之別，在對「比興」的反省外，自然也會體察詩歌的藝術性。與此思潮相應，關於《楚辭》藝術的研究，也在明末清初盛行。譬如他們多已能正視《楚辭》創作在藝術思維（想像）方面的最顯著的特徵——超現實的性質及其象徵系統的構成。明陳第《屈辭古音義》謂〈九歌〉非純為祭神之歌，其所計者「純乎虛者也，如仙人神女浮遊於青雲彩霞之上，若可見，若不可見；若可知，若不可知；而其深致，又未嘗不可見不可知者也。」於是乎贊嘆曰：「蓋虛以寓實，實不離虛，其詞藻之妙，操觚而摘采者既擬而莫之及，而理道之精，通經學古者將探索而未之到。神矣哉！神矣哉！」（〈題九歌〉）說到把「虛實」、「寓言」作為《楚辭》藝術性的本體觀念，明汪瑗《楚辭集解》中也說：「寓言者，寄己之情也。其言雖寓，而其情則真。吾情欲如是，而人不知之，無以自見，於是乎托之以言也。此之寓言，蓋與《莊》《列》齊諧、志怪等說大不相同。有寓言而虛者，有寓言而實者。如乘龍跨鳳、登天涉雲、扣閭闔、登閭風、遭道崑崙、發軔天津等語，皆寓言而虛者也。如回朕車以復路、退修吾初服、不忍與此終古、將遠逝以自疏，此寓言而實者也。豈可概視之以為設詞耶？」（《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頁 90）汪瑗對「寓言」的解釋，是以寄情為原則。也就是說，他認為《楚辭》在藝術表現上的主要特點是通過超現實的方式來體現現實的內容。屈原借助於神話傳說來抒寫自己現實的政治理想，以及對現實中美醜的鮮明愛憎態度，雖心遊天外，而立足現實，在藝術上運用的是「寓言」手法，是屬於「寓實於虛」的審美特徵。它儘管充滿了濃厚的「奇詭」情調，可是，作品所顯示的思想仍然是十分真實，「其言所寓，而其情則真」。以「寓言而寄情」來解釋〈離騷〉的藝術特色，是很有見地的。清林雲銘在《楚辭燈》中亦說：「讀《楚辭》，止要得其大旨，若所引典實有涉神怪者，惟以莊子所謂寓言視之，省卻許多葛藤。」（《楚辭燈·凡例》，台北：廣文書局）林雲銘認為

《楚辭》之所以難讀，正是其中多有涉神怪者，若必拘而執之，如漢、宋諸人，多難自圓其說，殊不知所謂「第一等手筆」的專書，原是借題寫景，言在此而意卻不在此。與「寓言說」相聯繫的是清魯筆的「幻境突出」說，他也認為「〈離騷〉多寓言，以比興為工。」〈離騷〉「下半篇純是無中生有，一派幻境突出。女嬃見責因而就重華，因就重華不聞而叩帝閭，因叩帝閭不答而求女，因求女不遇而問卜求神，因問卜不合而去國，因去國懷鄉不堪而盡命，一路趕出都作空中樓閣，是虛寫法。」（《楚辭達》：〈讀騷指略〉）魯筆評注《楚辭》時，總是愛用「幻境突出」、「奇幻百出」等術語來揭示《楚辭》的藝術表現。這種以「虛」「實」論騷的基點，自然推進了《楚辭》藝術批評。清朱冀對於〈離騷〉最後去國遠逝一段也從「虛」「實」角度論曰：「凡糗糧之精，車馬之盛，旌旗導從之雍容，名山大川恣我遊覽，蛟龍鸞鳳，惟吾指麾，奏〈九歌〉，舞〈韶舞〉，以怡性情而悅耳目，一切皆行文之渲染，猶畫家之著色也，極淒涼中偏寫得極熱鬧，極窮愁中偏寫得極富麗，筆舌之妙，千古無兩。尤注〈騷〉家不解此意，一一認為實事，不亦愚乎？」（《離騷辯》）這段文字頗為精彩地闡明超現實想像在情感表現上的作用。至於，蔣驥則從屈賦的奇妙章法和「奇詭」風格結合在一起認識，他既能

從藝術結構的角度出發，探尋屈辭的脈絡文理；又能從藝術意境上，論述屈辭的藝術魅力。他提出了「本意」「客意」之說。其評《楚辭》章法云：「《楚辭》章法絕奇處：如〈離騷〉本意，只注『從彭咸之所居』句，卻用『將往觀乎四荒』，開下半篇之局，臨末以『蜷局顧而不行』跌轉；與〈思美人〉本意，只注『思彭咸之故』句，卻用『聊假日以須時』，開下半篇，臨末以『願及白日之未暮』跌轉；〈悲回風〉本意，未欲遽死，卻用『託彭咸之所居』，開下半篇，臨末以『任重石之何益』跌轉；〈招魂〉本意，只注『魂兮歸來哀江南』句，卻全篇用巫咸口中，侈陳入修門之樂，臨末以亂詞發春南征跌轉。機法並同，純用客意飛舞騰那，寫來如火如荼，使人目迷心眩，杳不知町畦所在。此千古未有之格，亦說〈騷〉者千年未揭之秘也。故於〈騷〉經以求君他國為疑，於〈招魂〉以譎怪荒淫為誚，而不知皆幻境也。觀雲霞之戀態，而以為天體在是，可謂知天者乎！（《山帶閣注楚辭》：〈楚辭餘論〉卷上）」蔣驥從寫作技巧分析上指出《楚辭》有「本意」、「客意」。所謂「本意」，是指作者的題旨所在；所謂「客意」，是指為表現「本意」而生發的藝術想像。本意如同天體，客意則為天上的雲霞。〈離騷〉的本意在「從彭咸之所居」，卻用「往觀乎四荒」為客意，以馳騁想像，最後又用「蜷曲顧而不行」歸轉到本意上來。〈思美人〉本意在「思彭咸之故」句，卻用「聊假日以須時」展開下半篇，結尾又以「願及白日之未暮」跌轉本意。其他諸篇，「機法並同，純用客意飛舞騰那，寫來如火如荼，使人目迷心眩，杳不知町畦所在」，而這就是「幻境」。以前人們由於不知其中所寫的是「幻境」，故「於〈騷〉經以求君他國為疑」，「於〈招魂〉以譎怪荒淫為誚」，所以，他說這是「說〈騷〉者千年未揭之秘也」。所謂「千年未揭之秘」，誠然有些誇張，但是蔣驥確實看到屈原藝術風格的最可寶貴的精華，而其用「幻境」一語概括也是精準傳神。「幻境」的揭示與「本意」與「客意」的區別，意味著蔣驥釐清史與詩兩種文體的分界，判別記事性文本（紀事）與象喻性文本（感事）的不同，承認「虛構性」乃是屈辭的一種特質，作品本文獨具的審美特性。並且，文本是具有多種層面，有言內之事也有言外之意。

##### 五、寄寓感懷：

《楚辭》研究不僅是一種學問的钻研，並且是文人思想感情的表現與發洩，眾多的研究者，無論考其文字，訂其音韻，或闡發思想，揭明藝術，皆非單純的學術興趣所致，實有著審美情趣或思想情感共振的因素。循此，《楚辭》研究在詮釋目的上，表現出以「章句訓解」來探求屈原本意的同時，又常以之反照自身、揭明自己的情志。來欽之自視頗高，志在經世匡用，然生當照明，兵燹四起，鬱鬱不遇，只得著《楚辭述注》以自寓。黃文煥坐黃道周黨，因在獄中著《楚辭聽直》，以咎繇自況，明言「聽直」於《楚辭》，實為「聽直」於己獄之冤。李陳玉則「壯年筮仕，逮老而未獲一展，終身岩穴，窮愁著《楚辭箋注》，其遇雖不同，而以有同者。錢澄之著《屈莊合詁》，以〈離騷〉寓其幽憂，而以《莊子》寓其解脫。陸時雍則藉著《楚辭疏》以伸張「忠義」之教，正人心而匡世救用。王夫

之著《楚辭通釋》明「以旌三閭之志，實以寄忠愛憤激之情於南明。」周拱辰著《離騷草木史》同樣有「荒哀」見托之意。蔣驥也因為場屋困頓、經生多病，懷才不遇，才「獨於《楚辭》，功力頗深。」

#### 六、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劃內容及進度大致相符，隨著論題的開展，討論也題更加細緻、具體，但晚明清初的史料甚多，且多為普本，台灣不易尋找，並且論題待思索之處亦復不少，目前正逐一克服。今精簡報告，正是本計劃成果的濃縮。全文已先在政大中文系主辦的「百年論學——古典文藝思潮研究會」第六次討論會上教學，目前針對各項質疑進行思考、修改，盼年底能完成論文寫作、明年投稿學報。

#### 七、參考文獻

與執行本計劃相關之文獻有：

- 1、廖棟樑：〈從怪妄到寓言：論汪瑗《楚辭集解》在《楚辭》學史的意義〉，《輔仁國文學報》，1998年6月。
- 2、廖棟樑：〈寓情草木：〈離騷〉香草論及其所衍生的比興批評〉，《李毓善教授任教輔大四十周年志慶論文集》，2004年。
- 3、廖棟樑：〈知人論世：論蔣驥《山帶閣注楚辭》〉，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辦《第二屆文本與實在——人文學中的詮釋問題》，2004年12月3、4日。
- 4、廖棟樑：〈稽其道里：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的地理論述〉，國科會委託彰師大中文系主辦《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專題研究計劃成果發表會》，2006年11月25日。
- 5、現正指導輔大研究生吳燕真撰寫碩士論文：「黃文煥《楚辭聽直》研究」。